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E
XIANZHANG
HE
HUIGU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de 现状和回顾

语 文 出 版 社



科工委学院802 2 00584240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E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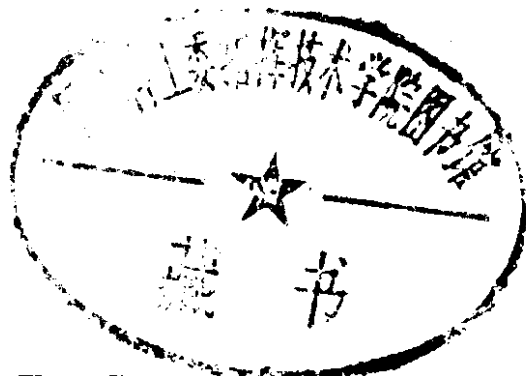
XIANZHUANG HE HUIGU

现状和回顾

朱一之

选编

王正刚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DE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

XIANZHUANG HE HUIGU

现状和回顾

朱一之 王正刚 选编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8 1/4印张 204千字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统一书号：9240·060 定价：1.60 元

ISBN 7-80006-036-5/H·11

目 录

现代汉语研究现状和发展(代序)……朱德熙 陆俭明(1)

回顾与展望……林裕文(6)

“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徐通锵 叶蜚声(18)

我国三十年来的语法研究……李临定(33)

三十年来台湾语法研究述评……林玉山(41)

汉语语法研究现状述略……邵敬敏(57)

语素研究述评……施光亨(65)

汉语动词分类研究述评……申小龙(75)

有关动词研究的几个问题……范 晓(88)

趋向动词研究综述……徐静茜(96)

汉词兼类研究概述……姚汉铭(104)

短语研究纵横谈……庄文中(110)

八十年代副词研究的新突破……邵敬敏(120)

宾语研究述评……任学良(135)

“兼语式”研究述评……孙德坤(145)

动补结构研究概述……薛 红(154)

汉语语序研究述评……晓 珑(166)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概观……林 立(179)

汉语句型研究述评……邵敬敏(190)

语法图解法的比较研究……曹聪孙(197)

现代汉语句组判别标准研究动向……王震国(212)

关于歧义结构的研讨·····	邵敬敏(218)
建国以来汉语口语研究综述·····	雷 雨(229)
1965年以来国外汉语研究概述·····	沈家煊(235)
普通话音位研究述评·····	李廷瑞(247)
后记·····	朱一之(261)

现代汉语研究现状和发展* (代序)

朱德熙 陆俭明

1. 这些年来，现代汉语研究出现了好势头，无论就广度和深度说，都较“文革”前有所进展。

这些年来的语法研究，开始比较注重对语言事实具体而又深入的发掘，而且比较注意从意义和形式的结合上去进行分析、描写、说明。研究的方面也有所开拓，如重视了对口语语法现象的描写，注意了对语法歧义现象的研讨，加强了对汉语句型的研究，等等。从理论和方法上说，不再囿于传统的只满足于对句子分析的做法；现在，分布、替换、预设、提取、位移、空位等观念已逐渐引入汉语语法研究；层次分析已在语法研究和语法教学中被广泛运用，变换分析、语义特征分析也开始在语法研究中运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语法研究中开始出现了突破共时和历时的严格区分，将横向的各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和纵向的古今语法之间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这样一种研究路子和方法。

在语音研究方面，加强了语音实验工作，初步建立了“实验语音学”这一边缘性学科。到目前为止，科学院声学所、社科院语言所和北大、清华等十一个单位先后建起了不同规模的语音实验室。几年来，已发表了一批反映语音实验初步成果的学术论文。

在词汇研究方面，北京语言学院等单位进行了常用词词频统

* 题目为编者所加。

计，这一工作不仅对词语教学，而且对今后的词汇研究将会起很大的作用。

这几年来的词典编纂工作很有起色。《辞源》、《辞海》、《现代汉语词典》先后完成了修订工作，出了新版；大百科已开始分卷编写并陆续出版；《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正在紧张编写中；至于大、中、小型的成语词典、同义词词典、各类学生字(词)典、作文词典、义类词典、熟语词典、歇后语词典以及各门学科的专业词典，如雨后春笋出了不少。

方言调查研究工作，这几年来做得比较扎实，除继续进行大小各点方言记略、文白异读调查研究等工作外，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调查研究：(1)连续变调的调查研究，(2)基本词汇的调查研究，(3)语法(包括句法和构词)的调查研究，(4)方言地理的研究，(5)汉语方言分区的研讨等。现在还正着手绘制方言地图。

修辞研究方面开始有人冲破盲目的修辞格崇拜，着重从表达的角度去研究修辞。

更可喜的是，这些年来语言学界开始和科技界合作，在语音合成、语音自动识别、人工智能(包括自然语言理解)、汉字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等方面全面展开了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2. 但是，不能不指出，现代汉语研究总起来说还是不深不细，还是粗线条的，空白也还很多。

对于现代汉语语法基本上只勾勒了一个大概的框架，这个框架好不好，是否符合汉语事实，也还难说。语法中的许多问题，大至汉语语法的特点问题、词和词组的划界问题、划分词类的具体标准问题、单复句的划界问题、句型归纳问题等，小至一个个常用词的具体用法问题，都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情况都还不明。至于研究分析方法也还有待于创新。

语音研究方面虽有较好的基础，普通话声、韵、调的状况大

体上是清楚的，但是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看，也有许多问题，如普通话音位系统问题（如何归纳，归纳为多少个音位为宜）、轻音儿化的规范问题、儿化韵中的音位问题、连续变调问题、句调问题、轻重音问题等等，都搞得不是很清楚，有的甚至根本未触及；至于运用现代化手段来研究、处理语音上的许多问题也还刚刚开始，还缺乏经验。语音合成只是初步取得成果，并未达到逼真的地步，语音识别问题还刚开始研究。

词汇研究一直是个薄弱环节，特别是词义的研究更薄弱。

词（字）典编纂出版了不少，但好的不多，特别是词语用法词典更少。

方言调查与研究，语音方面调查多一些，但调查的点也还不是很多；方言词汇也只调查了少数几个点；各方言语法调查描写就更少了。至于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方言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这工作做得更差。

修辞研究虽然个别人有所突破，但总起来说还没跳出陈望道的框框，多数人还是热衷于搞辞格。

理论建设基本没做，特别是怎样从对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中总结出新的语言理论来，目前还谈不上。

总之，现代汉语研究问题还很多，这一领域需要我们去继续开垦发掘。

3. 台湾、香港和国外（如美国、日本、法国、苏联等）也有一批从事现代汉语研究的专家，他们这些年来或利用结构主义的一套理论方法，或利用转换生成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语法、语音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汉语的一些方言（如闽语、吴语、粤语等）的语音、词汇也作了些调查研究工作，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们的研究也还是粗线条的，而且由于国外学者所依据的语言材料大多是第二手的，例证也不是很规范，许多结论都很值得商榷。

4. 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进入信息社会, 语言学越来越受到现代科学的影响, 同时也越来越受到现代科学的重视。现在, 语言学正逐渐发展成为多边缘交叉性学科, 并且在以往的只研究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旨在为语文服务的传统语言学的基础上, 正发展出研究人与计算机之间的信息交流、旨在为现代化科技服务的工程语言学, 这包括语音合成、语音自动识别、人工智能(包括自然语言理解)、文字信息处理、机器翻译等。

现代汉语研究是整个汉语研究的核心, 时代的发展要求现代汉语研究肩负起一为语文服务、一为科技服务的双重任务。现代汉语研究如要完成这两方面的任务, 这就需要: (1) 进一步面对现代汉语(包括方言)语言事实, 从语音、词汇、语法、语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分析、描写, 特别是要进行往细微方向发展的微观的研究。(2) 加强跟数学、心理学、自然科学和电子计算机的联系。(3) 在学习、借鉴国外先进语言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同时, 加强理论建设和研究方法的革新, 特别是要注意如何进一步将横向的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与纵向的古今之间的比较研究结合起来; 此外要加强定量研究。

5. 根据上述情况, 初步考虑近期内需开展研究的项目如下:

- (1) 现代汉语词类研究
- (2) 现代汉语句型研究
- (3) 现代汉语复句研究
- (4) 现代汉语复谓结构研究
- (5)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
- (6) 编写各类常用词用法词典
- (7) 现代汉语常用词探源
- (8) 现代汉语句调研究
- (9) 现代汉语轻重音研究

- (10) 现代汉语轻音、儿化研究
- (11) 在方言调查的基础上逐步编写出各地方言的方言志
- (12) 方言语法调查研究
- (13) 北京话口语调查研究
- (14) 双语对比研究
- (15) 作家语言研究
- (16) 汉字信息处理的进一步完善
- (17) 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
- (18) 双语机器翻译研究
- (19) 语音合成的进一步完善
- (20) 语音自动识别研究
- (21) 汉语拼音正字法研究
- (22) 儿童语言研究
- (23) 成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

回顾与展望

林 裕 文

建国以来的语言科学研究，无论从规模看，从取得的成绩看，从培养出的人才看，都是解放前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它和人民的密切联系，它所发挥的社会实践的效用，更是解放前所没有也不可能想象的。如果拿开采煤矿作比，解放前的作业规模很小，是各人挖各人的，解放后则是有明确目标的集中力量的大规模的开采。这个目标就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语言科学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语言工作者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发挥语言科学的社会实践作用，必须团结语言工作者，开展学术研究，交流工作经验，不断总结提高。《中国语文》正是在这种需要之下创刊的。它承担了十分重要的任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三十年来，《中国语文》和我们的国家一样，在曲折的、坎坷的道路上前进着。今天，形势要求我们加快步伐，朝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引的方向阔步向前。本文试图对现代汉语的研究工作（主要是语法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与展望，借以交换意见，携手迈进。

一 规范化和现代化

1951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正

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社论着重提出的是重视民族语言的规范，扩大它的影响。当然，在普及规范的工作之中，人们会发现规范不够明确的问题。有人认为：普及规范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而明确规范是科学工作者的任务。象《中国语文》这样的杂志，它的任务该是从事语言科学的研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解放之后，现代汉语的研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把研究工作和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联系在一起。罗常培、吕叔湘明确指出：“不能把这两种工作割裂开来。事实上研究语言就不可能避开语言规范的问题。”^①《中国语文》从1952年7月创刊到1966年6月被林彪、“四人帮”扼杀为止，所发表的现代汉语方面的文章，基本上是体现了这种指导思想的。

1978年4月，《中国语文》编辑部召开的批判“两个估计”、商讨语言科学发展规划座谈会的“会议纪要”中，提出“语言科学现代化”的问题。这当然不是说，语言科学现代化是最近才提出来的任务，语言科学担负起规范化任务的开始，也就是语言科学走向现代化的标志。但是，汉语规范化和语言科学现代化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互相替代。当然也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明确。语言科学的现代化问题，大概是由于讨论不够，就不那么明确了。语言科学现代化，要提倡语言科学同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要发展和自然科学有关的边缘学科。这自然不错，不过仅仅是这样理解，看来是狭隘了一些。“会议纪要”上曾提到我国语言学的底子不厚，特别是受“四人帮”破坏之后，同语言学的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至今我们还没有一部较详尽的现代汉语语法，没有一部汉语大词典，没有一部汉语发展史，没有一本汉语方言地图集，没有一部主要利用汉藏语系语言材料的普通语言学著作，也没有一套成体系的、有较高水平的语言学科教科书，至于比较语言学、

数理语言学等，那就更为薄弱了。”^② 这些是不是语言科学现代化的内容？如果是，则语言科学现代化显然应该指语言科学必须具有世界先进水平。而如何使语言科学和社会实际应用紧密结合，如何使语言科学和现代科学技术紧密结合，这只是语言科学现代化的两个重要任务，当然不是任务的全部。这两个任务，前者与规范化工作相联系，后者是与自然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总之，语言、科学的现代化工作虽然不是规范化工作本身，却包含有规范化的研究内容在内。应该肯定，汉语的规范化工作必须有语言研究的成果作基础，规范能否明确，和对现代汉语研究工作的好坏是密切相关的。

三十年来的情况充分说明了这种关系。五十年代的现代汉语研究是在汉语规范化号召下开展起来的，《中国语文》对这一研究方向的掌握，对研究工作的组织和推动，无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限于刊物的性质，它发表的文章侧重各种问题的研究，对规范的普及工作难以充分兼顾，但自1956年到1961年连续刊载《语文短评》，在扩大规范的影响方面，也做了有益的工作。

规范化推动了语言研究工作，但是语言研究并不限于直接与规范化有关的问题。这大概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195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词类问题讨论，1955年开展的主语和宾语问题的讨论，^③ 虽说是汉语语法学的发展中出现的研究课题，但不能说和汉语规范化工作没有联系。应该指出，这两次讨论，都是《中国语文》1952年到1953年连载《语法讲话》引起的。

《语法讲话》在划分词类上用了“共同性质”和“共同用法”的说法。如说名词的用法是前头可以加数量词，动词的用法是前头可以用“不”来否定。这个“用法”实际上是运用了功能标准或结构标准。《语法讲话》又提出根据位置先后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应用功能标准或结构标准区分词类，当然不是从《语法讲话》

开始；根据词序来确定句子成分，也不是《语法讲话》第一次提出来的。但是它作为一种既属描写范畴，又有规范性质的语法，连续发表在一个有影响的刊物上，提出的标准和方法，引起人们注意，而且人们会用不同的尺子（包括理论的和实践的）来衡量一番，那是很自然的。

回顾词类问题的讨论，主要的收获有三点，即明确了：（1）汉语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但仍然有词类的分别。（2）概念标准和句子成分标准都解决不了汉语的词类问题。（3）词类是词的语法分类，依据词的功能或词在结构分布中的对立来分类，是比较合理的。

以上三点，实质上反映了理论上的三个问题：

第一，形态不发达的语言有没有词类？或者说，划分词类的根本依据是词的形态变化还是词的功能？

第二，意义即概念上的类别，能不能作为语法上划分词类的标准？

第三，分布理论在词类问题上如何运用？

这三个问题是有联系的。讨论从汉语有没有词类开始，接着是意义标准和功能标准的对立。讨论涉及什么是功能，很快就转入第三个问题了。

第三个问题比较复杂。有人认为依照句子成分确定词类才是真正的功能标准。证据是《新著国语文法》给名词设了七个位，唯独没有述位，而动词则只处于述位。这不正是说明了名词和动词在谓语位置上的对立吗？问题是传统语法搞全面对当，淹没了这种对立。让词类和句子成分全面对当，拿具体的词来看，必然是没有定类。这种似是而非的功能，并不是真正的分布方法的运用。对立的情况究竟怎样，各种语言有所不同。我们只能根据汉语的词的对立情况来解决词类问题。

可见词类问题的讨论，不能仅仅归结为传统的形态标准和功

能标准的选择，也不是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关于词类理论的重复。事隔二十年，情况已经有了变化。五十年代的这次讨论，如果从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看，该是在继承、吸收与改革的过程中，进一步探讨如何理解和运用分布原则的问题。

主语宾语的讨论包括：(1)汉语主语宾语的分别是依据意义(施受关系)还是依据形式(词序先后)？(2)在句子成分的评定上，如何运用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3)句子成分的形式标志是什么？是不是就是词序？前两个问题谈得多一些，第三个问题没有展开深入的讨论。在四十年代，吕叔湘对主语宾语问题已经作过细致的分析。^④这次争论的焦点在以意义为主，还是以词序为主，也就是说，在意义和形式发生矛盾的时候，主要是依据意义还是主要依据形式。

从成分的评定看是如此，提到理论上便是形式和意义如何结合的问题。在讨论中大家肯定了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这是一大收获；可是到底如何结合，则是尚待探讨的问题。问题的进一步解决，看来须从更根本的地方入手，这就牵涉到析句的目的、方法以至有关理论。近年《中国语文》开展的析句问题的讨论，可以说是词类问题和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必然发展。看到这种发展的趋势，组织大家进行讨论，其意义远不止于解决问题本身。如果我们把眼光看得更远一些，将会觉察到这些讨论不但是语言规范化研究工作的一个部分，而且在语言科学现代化方面，也是不可缺少的准备。诸如此类的讨论，有如物理学上对杠杆作用的研究，似乎很抽象，其实它是同许许多多具体的机械相联系的。

二 体系和方法

这里讲的体系，指的是科学体系。有人说，科学体系的区别大多是形式上的，因为客观事实本身并无两样，所以不同体系在

实质性上的区别其实很少。事实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在语法方面，提到体系，人们很容易想到《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这个体系是以规范语法的形式出现的，它的影响远远超越中学语法教学的范围。在普及汉语语法规范方面，在改变中学语法教学体系分歧造成的混乱局面方面，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在理论探讨中，人们不断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些教师和语言学者试图作这样或那样的改革，同时希望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语文》在六十年代开始注意到方法的评介和探讨。

如果体系的不同仅仅是基本上相同的语法思想和方法的不同表述，这样的不同就不值得那么重视。如果体系的不同是语法思想和分析方法的差别，这就需要从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探讨了。对汉语语法学体系的意见，虽然前一类分歧多一些，而后一类分歧却是更值得重视。但是这两种情况往往混杂在一起，从杂乱的现象中理出方法这个头绪来，才算是抓到了关键。

《中国语文》从1961年开始，发表了朱德熙的《说“的”》(1961)和《论句法结构》(1962)，吕叔湘的《说“自由”和“粘着”》(1962)和《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1962)。虽然没有形成一场较大规模的讨论，但就其对语言研究的影响看，却是极其深刻的。特别要提一提的是，在五十年代中对欧美语法学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批判的余波未息的情况下，有的语法学家仍在积极地从事借鉴和吸收的工作，敢于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充分表明他们的学者风度，也可以看出《中国语文》对党的文化事业的忠诚。

这一类文章涉及许多方法问题，如功能替换的方法、分布的方法、层次分析的方法、变换的方法等等。并不是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立足于汉语语法科学的现代化，探讨借鉴国外语法研究中的新成果。因此，即使作为介绍来看，也并非述而不评。例如

吕叔湘在《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一文中着重评介这些原则方法在汉语中如何运用，指出它们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朱德熙使用“变换”方法，但并不同于哈里斯的变换方法，也不同于乔姆斯基的转换。他重视句子中的隐含的语义结构关系，也并不是“深层结构”的再版。

经过了十年动乱，停滞了的学术讨论又活跃起来了。当前析句方法的讨论，既是五十年代词类讨论和主语宾语讨论的发展，又是六十年代方法探讨的继续。中心词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孰优孰劣？它们各自的适应性和局限性怎样？层次分析和中心词分析是否对立？是否矛盾？两种方法能否结合、能否相互补充？要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作出准确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是，层次分析究竟是不是一种方法，层次分析和中心词分析法的理论依据是否相同必须首先考虑。不在方法上争取突破，要对语言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既有困难，而要建立一个较好的句法体系，也就不大可能。

这次讨论，有一个重大的收获：不管持哪一种观点的人，都承认语言结构是有层次的，汉语也不例外。既然层次是大家所确认的语言结构的特征，那么根据能否充分反映层次作为检验方法优劣的标准之一应该是适宜的。方法总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人们可以加以选择。我们不能离开目的去评价方法，却可以而且必须在分析语言结构时，选择或寻求更有效的反映语言结构特点的方法。

语法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编写出一部高质量的学校语法教材当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学校语法必须利用语法科学研究的成果，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强调学校语法的特殊性而忽略了这个基础，甚至把它们对立起来，恐怕是不恰当的。应该肯定，学校语法、理论语法、描写语法等等，虽然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毕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语法学的科学化、现代